

# 人權教育是抵抗中共的最佳利器 ——破解暴力的極權政府\*

李明哲

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專案經理人  
人權工作者

## 摘要

過去威權統治給了我們一個錯誤的價值觀，讓我們服從權威。台灣雖然民主化了，但權威統治加諸在我們身上錯誤的思維模式卻沒有改變，所以李明哲被中國抓捕時，很多台灣人不斷要求李明哲的妻子和中國妥協。正如現在台灣面對中國侵略，一樣有很多人認為台灣在挑釁。如果這些錯誤的思維模式沒有改變，我們永遠無法真正走出威權歷史，也無法面對中國的打壓

要去除過去錯誤的價值觀，我們必須從台灣過去反抗權威的歷史中找到力量。過去台灣的反抗歷史中有人權價值的堅持，有對威權的英勇反抗。只有真正認識台灣過去的反抗歷史，我們的思維模式才能改變，我們能理解自由的追尋必須付出代價，也願意付出代價去維護我們今天所享有的一切。

最後，我們必須認識中國，這樣才能理解台灣和中國的差異是價值觀的差異。我們是為了捍衛我們所珍惜的價值，拒絕中國的侵略。

## 關鍵字

自由、人權教育、中國、長臂管轄

---

\* 編按：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於2023年4月26日舉辦「人權星期三@蟄伏與重裝上陣：李明哲返台一年談未來」座談活動，本文根據李明哲先生的演講內容整理而成。李明哲先生以及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概允授權刊登本文，特此致謝。

## 壹、停下腳步或是繼續前行？

大家好，我叫李明哲。

如果從來沒聽過，很正常！如果有聽過，一來過去的事情我就不需要多講了，二來講太多會浪費大家時間，所以今天是要來講未來的事情。

我現在最想去的地方就是中國（湖南）赤山監獄。我發誓，如果有一天中國民主化，我可以去中國了，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赤山監獄，去親身看看那裡的犯人，看看我以前待過的地方。人在面對困難的時候有一種心態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去面對——要面對它、相信可能克服它；你若不面對，就是永遠、永遠被它壓在那裡。

有人很疑惑問我，你回來了，為什麼不在家裡休息？我回來的時候是四月中，回來檢疫隔離完，召開記者會，大概是五月中，然後七月就回文山社區大學工作。<sup>1</sup>回去的時候，鄭秀娟校長也問我：「你確定要這麼早回來？」我說，當然！因為對我來說，要「恢復正常」只有一個方法，就是面對——包括不斷地向人家講發生過的事情、不斷地向人家講這段時間坐牢的事情。說出這些事情當然會痛，但是你越講——像我，到現在已經講了非常多場——講到現在，那個痛的感覺越來越少了。雖然還是有，但是已經不影響我現在的任何事情。當你直面的時候，就是療癒的過程。如果我一直躲在家裡的話，那麼現在的我還不太會正常。但我說的是個人的習慣，不代表每個人都要這樣做。

## 貳、為什麼要認識中國？

我今天想講的是我未來要做的工作。這段時間我跑了很多團體，如那些過去聲援過我的團體；也去了很多學校，包括國中、高中、大學都有，甚至也去過國防醫學院——當時我還嚇了一跳，軍校為何來找我去講？這麼多場演講下來，讓我愈來愈瞭解台灣社會的一些想法，包括救援過我的人和其他的人。我大概總結了一些，還不算是結論，只能是到目前為止我的心得、想法吧，而這些心得、想法都與我未來做的工作息息相關。

---

<sup>1</sup> 編按：李明哲於2022年4月15日返抵台灣，回台後第一次公開露面是5月10日於立法院舉行的記者會。

我在社大主要是推廣人權教育，分三個部分：一是認識中國、二是人權教育、三是台灣過去的歷史。我認為，以當前我在社大的角色，這三件工作是最需要做的事情，這與我總結這五年的事情有不可分的關係。

第一是認識中國。我相信很多朋友——包括我們周邊——可能很討厭中國，我也很討厭中國。但是，有的人的想法是，因為很討厭中國，所以不要聽到任何跟中國有關的事情，排斥一切與中國有關的訊息。真的有很多朋友是這樣子想的。但是我發現，他們在討厭之餘，其實是最容易被中國影響的一群。他們看臉書、影片——如養貓、養狗、做菜的影片，或許覺得這些資訊無害，但是「通路」卻因此建立起來了。所以，如果你不願意瞭解中國，反而最容易被中國影響，因為你看的這些影片都是「中國的」，如果要釋放假消息，你就成了它的管道之一。所以我覺得無論討厭中國或者喜歡中國，在台灣你都要瞭解中國，因為中國就在我們旁邊，每天都在影響你我。如果不願意了解中國，對台灣是一個很大的損傷。

我在這一年間多次接受外國媒體的訪問，有一個很悲哀的結論——全世界主要國家的記者，對台灣的關心程度遠超過我們自己。外國記者很訝異的一點在於，台灣人怎麼可以這麼不關心自己的前途？這麼不關心中國對台灣的影響？然後對中國這麼地不了解？當被問到這個話題的時候，我也很無語。我覺得當你了解中國，無論是中國的人權或中國的建設，你會了解到中國這個國家是怎麼樣的狀況。它的經濟發展耀眼，如果你到過上海，你會覺得它是高、大、上，十分華麗。但華麗的背後有什麼？有的是很多人的犧牲。中國社會流行「躺平」與「社畜」。什麼叫「社畜」？中國的年輕人出了社會以後面對高物價、高房價，根本是一籌莫展，就好像畜生一樣，完全沒有辦法，既沒有辦法生存，也沒有辦法反抗，所以到最後只好做一件事，就是「躺平」，什麼都不管，兩腿一伸躺平。所以，我們就能瞭解白紙運動時，為什麼很多年輕人站出來？因為這些年輕人被逼到沒有辦法——原本的生活就困難，又被疫情逼到死角，年輕人完全無法維持一般的日常生活。不管你將中國視為對手，還是為了要與它統一，我相信你都要了解這個國家。如果他（中國）是我們的對手，你得要了解你的對手是什麼樣子，兩軍對陣，你對敵軍完全不了解，試問要如何打仗？反之，如果你覺得中國是一

個你想要與他統一的國家，你要思考——人可以自私，只為自己的子女設想——你願不願意讓你的子女未來生活在那樣的國家？這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在接受很多外國媒體採訪之後很深的感想。

### 參、人權教育教你如何擁有自己的判斷力

另外一個令我感到迫切的問題，是台灣的教育。我深刻體悟到人們的思維存在嚴重的瘋狂。不論是在我的事件，或在富察的事件披露出來的時候，很多人的第一個反應是：李明哲為什麼要去中國？楊智淵為什麼要去中國？富察被抓的時候也是一模一樣。<sup>2</sup>但這些人沒有質問中國為什麼抓李明哲？為什麼抓楊智淵？為什麼抓富察？在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我們仍然習慣對受害者嚴格，對加害者寬容，為什麼還是這樣子？有些比較年輕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在威權政府時代下的教育，是教導人民對有權力的統治者忍讓，講的是民不與官爭。台灣雖然民主化了，這個思維卻一直還在。

我曾經聽到有人問，台灣的教育如何才能做到像香港以前那樣？為什麼香港有那麼多的中學生在 2019 年時為了「反送中」站出來？而且每位站出來的中學生都講得頭頭是道？他說，香港的教育太成功了，而台灣的教育太失敗。當你去看台、港教育的時候，會發現一個根本的差異：香港中學生的歷史考題都是申論題，沒有一題選擇題。反觀台灣的考卷，幾乎都是選擇題，沒有申論題。選擇題與申論題的差別在哪裡？選擇題是一個由上而下授予的知識，學生背誦這些「標準答案」，鼓勵相同而排斥不一樣的回答，認為你選擇不一樣的答案，就是你很奇怪、你是異類。而申論題是要學生講自己的意見，首先就肯定了每個人的意見都應該是不一樣的，認為有差異性是很正常的，鼓勵差異性，並且訓練人們思考。所以教育方式的不同，絕對會導致結果的不同。回過頭來檢視，上述的教育模式在台灣改變了沒有？答案是沒有。這樣的教育模式從過去到現在從未改變過，改變的僅有知識上的內容——過去是大中國教育到現在是台灣本土教育——但是思維從來沒有改變。台灣雖然號稱是民主化的，

2 2023 年 4 月 25 日浙江省溫州地方政府正式以涉嫌「分裂國家」罪，向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起訴台灣民族黨副主席楊智淵，而楊智淵自 2022 年 8 月 3 日以來即遭中共逮捕並限制住居。台灣八旗出版社總編輯富察（本名李廷賀）於 2023 年 3 月至中國探親後失聯，中國國台辦於 4 月 26 日表示國安機關正在調查李廷賀危害國家安全的情事。

但是思維沒有改變，停留在過去國民黨威權政府時期留下來的所有思維，包括對統治者的忍讓。所以，當台灣人被中國抓捕時，大部份人在第一時間都問為什麼要去中國？卻很少問中國為什麼要抓人？如果這樣的思維繼續延續下去，我想請大家去思考看看台灣還有沒有前途。

這裡，回頭說我要在社區大學做人權教育的理由。我在文山社區大學堅持在公民週規劃人權系列講座，這是台北市其他社區大學都沒有去做的。人權價值是讓人思維改變的根本性教育，讓我們重視人的基本價值，如果根本的思維不改變，台灣再怎麼政黨輪替、再怎麼去除大中國思想、再怎麼將蔣介石的銅像推倒，怎麼改都沒有用，因為人的思維鼓勵相同、不鼓勵差異，永遠希望人們像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所以我要在社區大學做人權教育，這是從過去五年以來，直到現在都很觸動我的事情。

我還想再分享一個人權教育的重要性，即是我們能不能理解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這是什麼意思？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享有著自由，卻從來沒有為自由付出過代價、從來沒有。我們現在所享有的自由是上一代的人替我們爭取的，好比鄭南榕先生用他的生命幫我們爭取了言論自由。但今日我們卻將言論自由說成是搞政治，成功大學以政治不應該進入校園為由，不願意命名南榕廣場，試問鄭南榕爭取的言論自由只有民進黨可以用嗎？還是只有支持台獨的人可以用？國民黨不需要言論自由嗎？支持兩岸統一的民眾不需要言論自由嗎？言論自由到底是政治還是人權？我覺得這是所有人都應該重新去思考的問題。

我還可以再舉出一個為自由付出代價的例子。我太太在救援我的時候就付出了一些代價。她被很多人罵，因為她救我的「方法」跟大家認知的不一樣，一般人覺得對抗有權勢的統治者就是要退讓，怎麼會有人用這樣高調的方法，好像要害死她的先生？所以所有的救援案件都會面對一個聲音：家屬不要太聲張，一旦曝光就會害死當事人。楊智淵在這幾天被抓了，從去年出事以來他的家人有吭過聲嗎？有任何人出來聲援他嗎？他夠低調了吧？他的下場有更好嗎？至於李孟居，到現在竟然還回不來。<sup>3</sup> 但是，我不是要責備他的家屬，家屬

3 台商李孟居於2019年8月從香港入境深圳後失聯，同年10月底被中國視為間諜拘捕，並判處1年10個月刑期和褫奪公權2年。然而在出獄後，中國仍以尚有2年附加刑期為由，限制李孟居不得離開中國。李孟居直至2023年7月下旬始獲准離境，9月2日返抵台灣。

的任何態度都不應受到苛責，因為我們無法承擔家屬所承擔的苦難。但是客觀的事情仍應開放討論，好比我與李孟居一樣，都被判處褫奪公權兩年的附加刑，那為什麼我可以回來台灣，他不能回來？為什麼儘管已服滿刑期，中國仍可以用還有兩年褫奪公權為由不讓李孟居回台灣？這件事情李孟居是很不服氣的，他一直透過人脈、臉書表達意見，也與台灣的媒體聯絡，直言這是差別待遇。然後他開始埋怨家人為什麼不用比較公開的方式救他？為什麼私下與中國政府談判？他開始有這方面的抱怨，因為到頭來發現，向獨裁者忍讓不僅沒有換來鱷魚的眼淚，反而是更多的漠視。

我太太瞭解這個代價，她知道她不能決定李明哲什麼時候回來，但是她可以決定李明哲用什麼樣的姿態回來。為了今日讓李明哲正大光明地回來，她決定不要私下妥協，因為她知道如果我在妥協之下放了回來，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價。你可能會問是什麼代價？我出事的時候，就如富察現在一樣，中國製造了很多謠言，說我到中國嫖妓、到中國當間諜等，諸如此類的謠言非常多。如果我或我太太默認了，向這些莫須有的罪名妥協，或許我可以早兩、三年回台與家人團聚，但是回來以後，大概要一輩子背著這些污名了；即便回到台灣，唯一能做的事就只剩回家養老。中共深知沒有人會聽個嫖妓犯在這裡講話，也不會聽個間諜犯在這邊講話，它把我從一個小監獄放出來，再將我關進一個大監獄，這是極權政府的行為模式，我覺得這樣的思考模式是必須要讓更多的人知道的。我付出的代價也包括將監獄的事情向外界披露，而因此受到了處罰；但正因為我們願意付出代價，我的身軀雖然被監禁，但腦袋、心靈卻得到自由。反觀處在自由環境的台灣，如果你的腦袋被控制、對有權勢者只會退讓，說個嚴重的話，你與奴隸便沒有什麼差別了。

#### **肆、用人權教育抗中保台**

從另一個角度來談，我們現在都強調抗中保台，但如果要抗中保台，我們要怎麼樣抗中？怎麼樣保台？如果我們要對抗中國，我們要對抗中國的什麼？

要抗中保台，最重要的第一點就是以人權做價值；如果不以人權做價值，不讓民眾知曉我們究竟和中國有哪裡不同，不讓民眾知道中國與台灣的环境有什麼不一樣，人們就不會真的知道到底要不要跟這樣的國家統一。同樣的，若

不知道香港的例子，就不會知道一國兩制是什麼樣子；若不知道圖博的例子，就不會知道與中國簽訂和平協議會有什麼後果。看看香港、看看新疆，認識之後再來說這些東西好不好。有的人會說，這些遭判罪的就是愛講話的人；也有人講說，中共來統治沒有關係，我不吭聲就好了。人們可能承認中共犯下了侵害人權的事，但人權是政治，只要不講政治就沒事。這是缺乏人權教育的結果，也是因為人們沒有好好的認知台灣過去的歷史。所以我們要拿什麼來抗中保台？我認為就是人權教育，不然我們的抗中就會只是一個口號、一個形式。

在我離開的這幾年，我們的總統去蔣經國的七海園區，說因為蔣經國對抗共產黨，所以可以學習他抗中保台的精神。如果是這個結論的話，我可以告訴大家的例子。當初，因為我的案子要公開審判，官方覺得不能太難看，畢竟要演戲的話，演員一定要夠，所以找了兩位律師。這兩位名義上是要幫我辯護，實際上是控制我的言論，因為我出庭的時候他們不准我講話。他們說講話會對自己很不好，你想說的就交給律師去講，但這兩個律師是要控制我的言論啊。按這樣的邏輯推導，如果蔣經國可以因為對抗共產黨就值得被紀念，我這兩位辯護律師也可以稱作是人權律師了吧？為什麼？如果大家認為李明哲是人權工作者，他們兩位幫我辯護，當然也是人權律師啊。

現在的問題是，政府正在推動轉型正義，讓我們知道國民黨很獨裁的過去，但是永遠不願意告訴我們國民黨如何進行獨裁統治。你以為過去國民黨的特務系統是專職的嗎？舉個實例，有一個政治犯，他的兄弟也是政治犯，只是比他早出獄。他出獄以後就每天寫日記，結果過了十幾年，他突然在相關情治單位的檔案裡面發現了這本日記。他很訝異，因為這本日記放在他的床頭，從來沒有被動過，從來沒有消失過。後來，他發現一直以來監視他的人就是他的哥哥。原來，他出獄以後住在哥哥家，哥哥也是政治犯。在當時，政治犯出獄以後是找不到工作的，唯一的工作只剩下配合當時的情治系統監視別人。在記錄中，情治人員要求他哥哥監控他的時候，哥哥問了一句話，問你們要我弟弟的什麼檔案？是他參與政治的檔案嗎？還是他參與反政府活動的檔案？情治人員回答他，你不用去想，只要把所有生活紀錄的檔案都拿過來就好了，因此哥哥就把生活的東西全部拿給上面交差。如果我們不去瞭解這些——我們現在的

檔案裡面有很多特務的名字，但被蓋掉了——就等於我們只知道過去國民黨的邪惡，但國民黨如何扭曲和利用人性推行邪惡的統治？我們完全看不出來，這樣一來就不會知道這種操弄人性的手法，才是最恐怖和邪惡的本質。我覺得，這些思考都是現在非常需要的，所以未來我在社大一定會做類似的演講、講座、工作坊，用各類型的方法讓大家真正的認識台灣本土歷史、真正的認識中國、真正的認識人權教育，因為這樣我們才能真正——不要說對抗中國——對抗侵略者的思想，能夠真的讓我們撐下去。

我想再補充一點思維改變這個主題。老一輩人常常講「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過去國民黨為了統治，要大家對中國共產黨時時刻刻恐懼，這一個思維同樣沒有隨著民主化消失，反而一直流傳至今，使得在台灣無論討論任何事情，就算談的是人權議題，也有人會批評你是不是中共同路人；講環保的議題，也有人指責這樣是反對蔡英文政府。台灣社會總是處在抓匪諜的氣氛中，每當有人出事被捕，就有人講這是特務；富察出事的時候，也有人說他是特務，雖然我們不能保證富察是不是，但是這種只要碰到事情就開始抓匪諜的思維要怎麼解釋？為什麼我們認為某些人是匪諜？是因為他常常進出中國嗎？沒事他為什麼常常進出中國？所謂「沒事」的判斷，就已經把事情的對錯交給獨裁者，讓他容易操控。我曾經親身碰過一個例子。在我出事以前，有幾個認識的人，在中國福建汕頭的一個村搞維權事件。其中三個帶頭的人被當地的公安抓了，公安刻意將其中一人保釋（中國稱為「取保候審」），放了出來，另外兩人繼續關著。可想而知，這個被保釋出來的人會受到什麼懷疑。所有人都懷疑他出賣了另外兩個人，結果整個村裡面的維權陣營就陷入了混亂，開始彼此懷疑，到最後透過人跟人的懷疑，講出了不少訊息，當地政府就一一的把人全部又抓進去了。如果我們思考問題的判準拱手交給你的對手，跟隨中國官方報導所提供的標準——他是不是常常進出中國？為什麼沒事要進出中國？他在台灣出了一些反共書籍等——而不去判斷這個人究竟做了什麼、這個人在台灣做了哪些事情，這形同將我們自己的判斷權交到了對手的手中。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很懂人心的政權，它不但可以塑造它自己的形象，也會塑造它對手的形象。如果我們將判斷的標準都交給對手的話，就隨時可以決定在台灣誰是英雄，那



這樣我們的判斷就沒了。

## 伍、誰給了李淨瑜勇氣救援李明哲？

除了人權教育以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台灣本土的歷史教育。為什麼要特別重視台灣本土的歷史教育？很多人會問，李明哲的太太為什麼會有與一般人完全不一樣的想法？自我出事以來，前後有這麼多的台灣人被抓，沒有任何家屬願意採取公開的方式去救援，全部都覺得可以私下透過一些方式將家人救回來。但到目前所知，私下的處理並沒有給當事人更好的待遇。李孟居被判刑一年多，他刑期早就滿了，結果他因為附加刑回不來。楊智淵的家屬也沒有公開發聲，楊智淵被監禁了快一年，最近也被公開正式逮捕。

很多人問，李淨瑜（李明哲的妻子）的力量從哪裡來？她的力量來自台灣自身，我們原生的台灣歷史存在著這種國際救援，這種救援是過去的民主前輩留給我們的。從歷史來看，1960年代的蘇東啟案，就開始有很多外國人把台灣政治犯的經歷向國外揭露，包括愛琳達（Linda Gail Arrigo）和已經過世的梅心怡（Lynn Alan Miles）等。我可以不客氣的講，沒有這些人的幫助，台灣不會有民主。很多人認為，台灣民主化的關鍵是美麗島事件；在我來看，外國政府就美麗島事件向國民黨政府施壓是很重要的因素。既然國民黨說美麗島是叛亂事件，那就請公開審判，將事實說清楚。在此以前，國民黨的軍法審判從來沒有經過公開的審判，但是美麗島事件創下了一個例外：當時雖然沒有電視轉播，但在外國的壓力下，報紙將所有政治犯在法庭的言論全部公開，台灣人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政治犯主張這些事情！雖然不一定認同政治犯的主張，但是至少知道他們不是國民黨宣傳的江洋大盜，這些人是真心為了台灣好。若再進一步觀察，美麗島事件之後，很多政治犯的家屬、律師出來從政，但美麗島事件之前的政治犯家屬沒有一個出來從政的，更不要說律師，為什麼？因為美麗島事件透過公開審判，讓台灣人的人心有一個根本的改變。從整個國際來看，如果沒有外國人對我們的幫助，台灣不會有這些能力解決問題。所以我太太所做的事情是這段台灣歷史教會她的。

很多人覺得李淨瑜很冷血，但她之所以能那麼堅強，是因為她的辦公室就在專門整理台灣白色恐怖檔案，從這些檔案裡面，你能讀到許多可歌可泣的故

事，我隨便舉一個。過去有一名被國民黨抓的軍官叫韓若春，他因為在家人的壽宴上批評了一下蔣介石，就被人家檢舉，判了死刑，死前他寫了一封遺書給家裡的人。一名死刑犯留給家裡人的遺書是什麼？要哭訴自己被冤枉、哭訴自己好無辜、哭訴自己好可憐嗎？我告訴你不是。他有妻子和一名女兒，遺書的開頭希望他的妻子好好教育女兒，不要因為他的死而對人性持否定的態度，他希望太太給女兒一個健康的教育，讓她知道人權、正義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在遺書的結尾，他講了一句話：苦難的結束是幸福的開始。這句話的意思是，韓若春死了，但是我的苦難希望可以換來你們母女幸福生活。你會看到這個死刑犯在面對死刑的時候是如此的坦蕩，他並沒有把自己當作受害者，他用一種我們難以想像的正常心態交代他的妻子。

當你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會覺得自己面對所謂的五年牢獄，苦難算是太少。我太太因為研究很多白色恐怖檔案，有很多忘年之交。這些年歲大很多的長輩，很多是政治犯，有的坐過十幾年的牢。你知道他們怎麼說？有一名前政治犯，曾坐牢十年，當他聽到我被判刑五年的時候，就向我太太講一句話，「五年喔，撒泡尿就回來了，五年啊，晃一晃就回來了。」他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苦難在安慰我太太，因為他被關十年，有權利講這個話。還有一位政治犯，被關了大概八年多，他怎麼勸我太太的？「你先生在坐牢要勞動喔」，他說：「勞動很好啊」為什麼很好？「勞動的時候就會有很多朋友啊，很多獄友跟你一起勞動啊，你就不會像我們一樣被獨囚。獨囚就是要把人關瘋啊。」所以你會發現，我太太在處理我的事情時，這些前輩用他們的苦難安慰著她。當我們面對這些比我們更苦難的人，我們有什麼資格把自己當受害者？當你把自己當受害者，就覺得自己的軟弱是合理的，因為我是受害人嘛；當你不把自己當受害人，你就會有力量，那個力量會讓你克服很多的困難。所以對台灣歷史的瞭解，是我太太和我自己得以對抗這個苦難最重要的原生力量。所以有人說：「我們不要去看過去的歷史了」，錯！一個民族如果不從自己的歷史、不從自己民族的歷史找到內生的對抗威權的力量，這個民族不會強大。

各位知道，我被抓的前兩個月被關在不見天日的房間——沒有人可以講話、一個完全封閉的場所，我完全得不到任何外界的訊息——那是會把人關瘋

的。在那種處境下的人會產生一種變態性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你會愛上審訊你的人員。如果她是女的，我就愛上她了；他若是男的，就變成我很喜歡他。我很想每天都見到他，他每次來審訊我，我都希望他待得久一點，不要只審訊我一個小時，最好審訊我五個小時。為什麼？因所謂的政治犯都有一個毛病，就是很愛說話，當長達一個月沒有人跟你講話的時候，你對說話的渴望會超過一切，所以會愛上審訊你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什麼口供是拿不到的。

但是，為什麼我最後撐住，沒有被逼迫承認台灣間諜這個莫須有的罪名？因為在我出事的第二個禮拜，我收到了一封家書。當時我太太與一些公民團體公開呼籲中國要把這個事情講清楚。中國為了要有所回應，急需我承認一些當前已經有的證據，也就是所謂的罪狀。那他要怎麼勸我呢？中國派了一位「密使」與我太太談。也威脅我母親，逼我母親寫了一封信給我，信中勸我認罪，以及很多謾罵我太太要把事情鬧到美國、鬧到聯合國，準備要把我當烈士等等。當我讀到那封信的時候，仿若枯木逢春，覺得人生有點希望，因為我知道外界有人在關心我。當你順著統治者的邏輯不吭聲、按著它的方式，統治者就可以照它的方式，不受任何外界干擾地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我們就沒有辦法與之對抗。但是，只要有任何的動作，就可以打亂統治者的節奏。只要打亂它的節奏，也只有打亂它的節奏，不要說贏，才有不輸的可能。

這些方法哪裡來的？這些力量哪裡來的？其實都是從過去的政治犯檔案、從台灣歷史中得到的。你會瞭解到統治者怎麼因應外界的壓力，以及外界的壓力永遠可以逼統治者妥協。美麗島事件時，很多美國的國會議員寫信給蔣經國政府，而歷史檔案中會看到蔣經國政府因為外界壓力而命令情治系統要保存政治犯生命的資料。所以，不管多少人罵李淨瑜，說她是準備要參選、準備踩著老公的屍體往前行等等，她都堅信這個從台灣反抗威權的歷史中獲得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她從歷史當中找到力量，這是我們所有人都需要的。

我認為許多問題的根源都來自於過去威權政府時期的教育方針，但台灣已經民主化好些年了，這些思維卻聞風不動，從來沒有改變。

如果我們要對抗侵略者，最重要的內涵就是人權教育和台灣反抗運動的歷史，從教育去改變我們的根本思維。所以，我一定會在社大推廣人權思想和台

灣歷史。要先透過人權教育來改變思維，讓我們理解台灣和中國是價值觀的差異。而台灣本土反抗運動的歷史，會看到我們的前輩如何反抗權威。我們只有學習過去的經驗。才能有反抗威權的力量，只有這樣台灣才会有希望。

# Human Rights Educa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ciphering an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Violence

Ming-Che Lee

Project Manager, Wenshan Community College, Taipei City  
Human Rights Worker

Past authoritarian rule imposed upon us misguided values, fostering obedience to authority. While Taiwan has undergone democratization, our erroneous mindset of authoritative rule has not completely changed. This is evident when, upon the arrest of Lee Ming-Che by China, many Taiwanese individuals continuously urged Lee's wife to compromise with China. Similarly, as Taiwan faces aggression from China, there are those who perceive Taiwan as the provocateur. If these flawed thought patterns persist, we can never truly emerge from the history of authoritarianism, nor effectively confront China's oppression.

To discard past erroneous values, we must draw strength from Taiwan's history of resistance against authority. Within Taiwan's history of resistance lies a steadfast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and courageous opposition to authoritarianism. Only by truly understanding Taiwan's past history of resistance can we change our mindset, comprehend that the pursuit of freedom comes with a cost, and be willing to pay that cost to safeguard all that we enjoy today.

Finally, we must understand China in order to grasp the differences in value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We stand to defend the values we cherish, resisting China's aggression.

## Keywords

freedom, human rights education, China, long-arm jurisdiction

---

